

# 帝與僧共天下

曹仕邦

## ——談談佛教僧徒對越南建國的助力

上世紀曾有一場驚天動地的「越戰」，讀者們也許仍依稀記得。這場牽動全世界的戰爭<sup>1</sup>，其始肇端於南越吳廷琰政權對佛教徒的壓迫<sup>2</sup>，挑起越僧以自焚作抗議。嗣後其國僧徒不斷舉行政治性的示威，引致局面緊張，俾越共趁機蠢動而掀起。

越僧何以勇於做政治性的示威？原來越南的能建立為國，跟佛家僧侶大有關係，他們早已參預政治的活動了。

在討論本題之前，先簡略地交代越南的歷史。原來越南地區自秦朝以來便入中國的版圖，在西漢時，漢人在如今的紅河流域以迄順化一帶建立了交趾、九真和日南三個郡。降至東漢，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縣由於來自印度羯棃迦國的移民造反而建立了占婆國<sup>3</sup>。降至三國時的吳國、西晉、東晉、劉宋、南齊、梁、陳和隋都一直擁有了象林縣的稱爲「交州」的三個郡。到了唐朝，交州降而爲「安南都護府」<sup>4</sup>。及至中國分裂而爲五

代十國，分裂政權之間刀兵互競，無暇南顧，於是安南都護府群雄並起，爭奪地盤，最後由丁部領削平群雄，建立大瞿越國，從此越南脫離中國而成獨立國。建國之後最初三個朝代是丁朝（九六八～九八〇）、前黎朝（九八〇～一〇〇九）和李朝（一〇一〇～一二二五）。這三朝跟後來的朝代，全都倣效中國的行帝制，建年號。

丁部領（九六八～九七九在位）即位之後，史書稱他「丁先皇」，丁先皇太平二年（九七一）之時，史稱他所置的中央官計有：定國公阮匄、都護府士師劉基、十道將軍黎桓、僧統吳眞流賜號「匡越大師」、僧錄張麻尼<sup>5</sup>、崇眞威儀鄧玄光道士。

太平二年是丁朝建國的第四年，當時所置官位不過寥寥七種，而其中即有僧侶和道士被委任爲管理釋老二教教士的官員。按，僧道官在中國的設立，是由於佛道兩教盛行之後，朝廷委任專門統理兩教的出家人<sup>6</sup>。現

在丁朝立國伊始，便亟亟援引兩教教士任此職，可見兩教為當地社會普遍信奉，教士衆多，故急於置官管理，俾他們領導門下俗家信徒向政府效忠。

及至丁先皇駕崩，繼位的丁廢帝太平十一年（九八〇）登基之後，本年六月便被握有兵權的十道將軍黎桓所取代而建立前黎朝，史書改稱黎桓為「大行皇帝」（九八〇～一〇〇五在位）。這時佛教與政治結合的力量便第一次表現出來。

事緣大行皇帝天福八年（九八七），北宋遣使臣李覺來聘，前黎政府要選一位官員去迎接。可是李覺是一位善於吟詠的人，滿朝文武無人能跟他唱和酬對，不得已，只好找來一位法號叫名順的僧人，假扮成職稱「江令」的官往迎。見面之後，兩人吟詩唱和，非常高興。及至送李覺到賓館，李覺贈詩這位接待自己的「江令」而別。名順法師得詩，深怕皇帝以為自己私通外邦，於是將詩呈獻皇帝。

大行皇帝請吳匡越（即吳真流）國師審查此詩有無輕視本邦之意。吳匡越看到詩中有句云：「天外有天應遠照，溪潭波靜見蟾秋」，知道「蟾秋」指「秋天的月亮」，而「天外有天應遠照」，即謂中國的「天」之外另有一個越南的「天」，那麼越南的「天子」與中國的

「天子」地位相等，於是回說：「此詩尊陛下，與其主無異！」越帝大喜，在李覺辭歸之時，不特加以厚贈，更命吳匡越作一首曲給李氏餞別。

上述故事，被越南人視為非常成功的外交作為，後來的史家潘輝注稱名順與吳匡越之所為「足誇人才，國體增重，可使北人（指中國人）屈服。後來每北使返回，每有詩束餞送以耀人文，蓋實始於此也」。

問題是當年「足誇」的「人才」都是和尚，何以故？卻原來越南脫離中國而獨立之前，唐朝將原來華夏的「交州」降格而為「安南都護府」，前來主政的都護官往往不重視當地教育，於是越南有志之士都跑到中原去就學和服官，以致越南人曾出過一位官至唐朝宰相的姜公輔。由於人才外流嚴重，到了獨立建國之後，當地僧侶成了剩下來的飽沾儒學的知識份子。

不特此也，史書稱李朝於太寧四年（一〇七五）首次開科取士之前，想做官的人「雖聰敏之士、亦由僧道簡知」。「簡」指「選擇」，「知」指「推薦」，而太寧四年去越南始建國的「丁先皇元年（九六八）」凡一百另七年，這麼長時期都由僧人或道士向政府推舉參政的人才，而佛教勢力比道教大<sup>7</sup>，這亦反映出佛教對建國初期的政治支配力量了。

大行皇帝真個大行之後，由臥朝皇帝（一〇〇六～一〇〇九在位）。繼位，臥朝皇帝是一位暴君，人民怨望。這位暴君信任的左親衛殿前指揮使李公蘊是僧人李慶文的養子，兒時遊學六祖寺，僧人萬行見到他，一眼看出此人是「強壯之後，必能為天下明主」的非常人，乃收為門徒，加以刻意栽培。

到了景德二年（一〇〇九）臥朝皇帝駕崩之前，古法州延蘊鄉有一株木棉樹被雷轟，留下被電擊的震跡，看來像「樹根杳杳，木表青青，禾刀木落十八子成」的字樣。萬行知道後作如下的想法：「根者末也，猶臣也。青菁聲相近，青當作菁，盛也。禾刀木，黎字也。十八子，李字也」，既然「黎」要「落」而「李」要成，這豈非李氏取代黎氏的徵兆？於是鼓勵李公蘊作取代前黎朝的準備。李公蘊命自己哥哥帶萬行法師藏身蕉山，以便暗中替自己策劃取代帝位的大計。之後，李公蘊開始拉攏國內沙門，使支持自己。

及至是年十月臥朝皇帝大行之後，李公蘊很順利地取代前黎朝而建立李朝，史書改稱李公蘊為「李朝太祖」（一〇一〇～一〇二八在位）。

由於李朝的建立由萬行法師策畫，於是太祖即位後拜萬行為國師，作為自己的政治顧問，以後李朝的國

師們，都成了越帝的政治顧問，如李聖宗（一〇五五～一〇七五在位）時的國師草堂、李仁宗（一〇七二～一一二七在位）時的國師枯頭、李神宗（一一二八～一一三八在位）時的國師阮明空等，都有此作用。其中枯頭國師甚至有「或云賜之節鉞」<sup>9</sup>，與宰臣並立殿上，處斷天下事務「詞訟」的傳說。

除了重用有才能的僧人作自己的政治顧問之外，李朝皇帝更大施恩惠予佛教。史稱李太祖在即位的順天元年（一〇一〇）便即時創立八寺，度京師千餘人為僧，再在順天十年（一〇一九），更詔度天下人民為僧，這種措施是討好佛教同時也討好民衆的兩面手法。

何以言之？因為度民為僧，使出家人數目增加，是僧伽團體高興的事。而越南曾是中國的直屬領土，受了中國自三國西晉以來的宗教政策影響，也是編戶之民一經落髮受戒，便既不用負擔政府的租稅，更不用當兵，也是使老百姓高興的事。雖然此舉被後世史學家深不以為然，如陳朝（一二二五～一四一三）史家黎文休便作如下批評：「李太祖即位，宗廟未建，社稷未立，先於天德府創立八寺，而度京師千餘人為僧，至有毀形易服，百姓大半為僧」。黎氏作此批評，因為陳朝時越南儒學已抬頭，而「百姓大半為僧」，則全國有一半男丁不

用納稅服兵役，對國家的財政與國防損害實大。然而李太祖深知自己得國倚仗佛教支持，他在開國之初便度天下人民為僧，明知減耗國力，也先求穩定自己的江山再說。太祖而後，李朝再不見大規模度民為僧的記載，可見這是政權建立初期的權宜措施。

再者，李朝雖然討好佛教，但對佛寺並非放任不管，因為在李仁宗（一〇七二～一一二七在位）廣祐四年（一一〇八八），越帝將天下寺院訂定為大、中、小名藍，以文官貴職兼任這些寺院的提舉（監督），免得他們將善信布施的財物購買田土及代為耕作的田奴等作過份的經濟擴張。

至於李朝諸帝的修建宏麗佛寺，鑄造上千斤大銅鐘等的興福行為，這裡從略不舉了。

由於越南建國最初三朝的政權靠著佛教鼎力支持，故這二百五十七年來可謂「帝與僧共天下」的時代，而佛教最鼎盛的時代是李朝，而這朝代的建立由萬行法師栽培其弟子李太祖所建立，因此歷來越南佛教界對萬行的成就極其欽儀景仰。是以南越共和國傾覆之前，其首都西貢（今改稱胡志明市）有一家由越南佛教聯合會（Unified Buddhist Church of Vietnam）創辦的萬行大學（Van Hanh University）。在一九六九年仕邦赴

星洲南洋大學執教之前，曾因這大學的校長釋明珠博士（Dr. Thich Minh Chau）過港而有一面之緣，據明珠校長所言，他主校政的大學，其命名是爲了紀念這位千載以前的高僧，可見行公的政治與宗教成就如何爲越南僧侶的追念，然則南越僧徒過去的干政活動，亦可自此找到其淵源<sup>10</sup>。

至於前述南越僧人以自梵來抗議吳廷琰政權的宗教迫害，亦有其根源可溯。史書稱李太宗（一〇二八～一〇五四在位）天成七年（一〇三四）四月，有嚴寶性和范明心二僧，自行梵身而留下七寶（一批七種顏色的舍利子），太宗很高興，不特將這些舍利子留在梵身的長聖寺受香火供奉，更改年號爲「通瑞元年」。

在帝制時代，皇帝改元是一件大事，此舉給予當時佛教徒很大的鼓舞，紛紛仿效自焚，據後黎朝（一四一八～一七八九）史家吳士連（約一四七九時人）所言：「自時厥後，好名之人，祝髮爲僧，忍耐受死，如智通<sup>11</sup>之類，多矣」。

按，李太宗改元「通瑞」之年距離吳士連發言之年有四百四十五年之久，據吳氏所言，則越僧生時自以博取名譽從此成爲四百多年來的傳統，然則如今越僧以燒身作反抗宗教迫害的壯烈行動，應亦淵源於此。

至於陳朝與後黎朝的佛教與政治關係，這裡暫且不談了。

本文據拙作〈李、陳、黎三朝的越南佛教與政治〉（刊於《新亞學報》第十卷第一期（下），香港，一九七三，頁三四一～三七八改寫。這是仕邦於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度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碩士學位的畢業論文，由於修讀年限僅有一年，無法兼顧越南帝制時代最後一個朝代阮朝的歷史了。

註：

1. 越戰對全世界的牽動，屬於撰寫很多探討性的專書和論文都討論不完的。如今僅舉仕邦印象較深刻的兩例以見。其一是越戰結束後，大量越裔和華裔的南越國民買舟逃離故土，難民幾乎遍及世界各地，起碼所知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大利亞和中華民國都來了不少南越避難者。記得在澳大利亞留學時，親見南越難民跟華僑競爭，如第一大城雪梨（Sydney）某街有一家華僑開的雜貨店，鄰街便有一家南越難民辦的雜貨店。其二是美國加入越戰之後，各基金會的錢被移作戰費。在此期間，仕邦任職的新亞研究所向來受美國哈佛燕京社資助，到了一九六九年，這基金會

無力作財施了，研究所只好讓我們「停薪留職」，因此仕邦比國內的人放「無薪假」早了四十多年。幸好斷炊兩個月後，找到新加坡國南洋大學歷史系的教席，纔解決了生活問題。

2. 越戰發生後，有一位南越的華人比丘來港作吳廷琰政權如何迫害佛教徒的公開演講，仕邦曾往聆聽。據這位法師所言，吳廷琰總統有一位兄長是天主教的主教，此君想進一步升級為樞機主教（Cardinal，或譯「紅衣主教」，因為身膺此高級教職的人衣紅袍。這位前來演講的華僧不知這一專名，演講時一直說那位有野心的南越主教想做一個「紅衣服」）以圖取得可以投票選出教皇的崇高職位。而一個地區樞機主教的資格，必需其教區之內有相當數目的教徒，於是吳氏主教乃謊報教友人數。羅馬教廷乃派人來查探。恰好教廷特使來查之日正值佛誕，吳氏主教知道特使若見南越到處有佛教的五色旗在飄揚，真相將被拆穿，乃央他作總統的弟弟禁止佛家寺院或團體懸旗。佛教徒自然不服，導致信佛之人跟政府鬥爭云云。今謹佈導所聞如上，事件真相無意查究。

3. 參拙作〈占米與佛教〉，見本刊第八十九卷第十二期。

4. 因此直到現在，華人往往稱越南為「安南」，而越人最恨這一稱謂。
5. 古時越南僧侶出家後不廢俗姓，參拙作〈談談僧尼出家後所冠的「姓」〉，刊於《護僧》第五十五期，高雄，二〇〇九。
6. 中國的「僧統」是委任一位比丘來管理全國僧尼的中央官，而「僧錄」則相當於僧統的秘書長，如今大瞿越國的僧錄名「張麻尼」，很可能是一位被委此職的比丘尼。因為倘使由尼師負責處理尼眾事務，行事較為方便。
7. 觀乎正文所述丁朝立國之初，要委任兩位佛教的教士去管治全國僧尼，而僅任用一位道教的教士去統理全國男女黃冠可見。
8. 臥朝皇帝名黎龍鋌，因患痔病不能坐下，上朝時要臥着聽政，故史書作此稱呼。
9. 「節」是權杖，持節之臣是皇帝派到地方上主政或出使外國時的全權代表。例如西漢的蘇武奉旨出使匈奴，匈奴想誘他投降，蘇氏不允，匈奴把他遠徙到北海（今俄羅斯共和國西伯利亞境內的貝加爾湖）去牧羊，他一直「守節勿失」。因為他手中之「節」象徵他是漢帝的全權代表，他的堅決一直執持手中的「節」，表示他代表漢廷的尊嚴，永不屈節投降，因此也產生

了「守節」這一名詞。至於「節」的樣子，如今電映或舞台劇上演蘇武故事之時，飾演蘇武的演員手執一根杖頭彎曲的長杖，杖頭垂直掛有七團毛毬，這便是「節」的形狀。不過，如今已考知這僅是明朝所用的「節」，蘇武所持的「節」是一根竹竿，竿身上、中下纏上三團犛牛的毛。而「鉞」是一柄小斧，持鉞之臣暗示有生殺大權。枯頭國師若持有節和鉞，這是越帝委任他作有實權的重臣。

10. 參拙作〈從歷史根源看南越僧人的干政活動〉，刊於《中國學人》第三期，香港，一九七一。

11. 智通是越南陳朝僧人，其自焚行為請參拙作〈越南僧侶自焚傳統的來源〉，刊於《大陸雜誌》五十三卷二期，台北，一九七六。

### 偈詩精華錄

## 寂靜奢摩他

寂靜奢摩他，如鏡照諸像。  
如幻三摩提，如苗漸漸長。  
禪那唯寂滅，如彼器中燿。